

《革命者》监制管虎： 将生命挥洒于理想的浪漫是创作的原动力



管虎

电影《革命者》是管虎最新一部电影作品。作为监制，谈及《革命者》与其他历史题材、传记题材电影的区别，管虎认为每部电影创作之初并不会做横向的比较，但是会跟自己做纵向的比较。在2021年做一部94年前的人物传记电影，如何通过电影和今天的90后、00后观众交流，要用什么样的电影语言和表现手段，这些都是创作过程中要攻克的难题。考虑到传统叙事可能远远满足不了现在观众的需求，《革命者》尝试采用多视角、多侧面的叙事方式还原了一个生动的李大钊。在管虎看来，还原李大钊“将生命挥洒于理想的浪漫”是电影的追求，也是电影创作的原动力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《革命者》创作前做了哪些筹备工作？

管虎：李大钊先生的资料记载不是很多，但后人关于他的描述很多，各个角度我们都会找来看，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如何通过一种文人的爱国情怀实现和今天的观众共鸣？

管虎：电影中，李大钊先生的动作戏很少，基本都是写、读、说，对电影来讲确实是一个挺困难的事。怎么把这个人物的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，除了研读他所有的资料以外，还有一个核心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塑造一个可信的人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李大钊身上的浪漫感和诗人气质是如何体现的？

管虎：李大钊身上一定是诗人气质的，电影如果拍得太实，就会削弱这种气质。所以在跟剧组各部门沟通的时候，我会特别强调意境的呈现，所谓的浪漫我认为就是营造一种意境，在这种意境当中，呈现人物的人格魅力，有一种将生命挥洒于理想当中的浪漫主义。做这个项目我们骨子里是很钦佩李大钊先生的，这种浪漫主义也是我们钦佩的原动力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张颂文的表演有哪些特点？

管虎：张颂文骨子里有一种劲、一种气质，是能出重拳、能打动人的。生活中可能不会，你得需要长时间去了解，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神似比形似要重要一些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电影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？

管虎：技术上的困难主要是火车，火车是很难实现的，那个年代的火车现在只有东北一个地方还有，但是我们也不能频繁转场。于是美术部门做了一辆火车，火车做得跟机械的一模一样，是人力驱动的，当时经过了无数次的讨论，最后决定不转景，自己做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今年是建党100周年，电影工作者用电影创作的方式庆祝建党百年，相较其他文艺形式有什么自己的特色？

管虎：电影的好处在于走近，它可以很近、能够感同身受，能够闻到那个年代的味道，抚摸那个年代的肌肤，所以我们才会痴迷于电影的这种魅力。真的进去了、感受到了，你会觉得100年来一路走来

的不容易。



徐展雄

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，北大教授、北大图书馆馆长……这是拍摄电影《革命者》之前，导演徐展雄对李大钊的基本印象。今天回忆电影《革命者》的拍摄，导演徐展雄说那是一个矛盾、兴奋又有些畏惧的过程。

决定拍摄之初，徐展雄重走了李大钊在北京生活、工作过的地方。从老北大到景山，他尝试感受李大钊在北京生活的时代，也感受100年之后的中国发生的变化。

历史题材创作不容易，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接近人物，还原人物。创作之初，徐展雄给自己提了一连串的问题：李大钊是谁？李大钊是什么性格？如果他出现在我面前，他应该长什么样？他内心有困惑吗？有脆弱吗？

带着这些问题，导演徐展雄逐步接近李大钊，打破传统线性叙事，在118分钟的电影中，以多视角、多视角的方式还原了这个用“嘴皮子、笔杆子”改变世界的人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创作之初，做了哪些前期准备工作？

徐展雄：拿到剧本之后，我读了非常多的李大钊传记，包括很多人对他的回忆。因为我们选择做一个多视角的电影，因此还查阅了毛泽东、陈独秀、蒋介石等历史人物的传记，以及大量当时的历史资料，全方位地接近人物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创作过程中，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？

徐展雄：对一个创作者、导演来说，历史题材创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接近人物。李大钊是谁？我永远在问这个问题，李大钊是什么样的性格？如果他出现在我面前，他应该长成什么样，他的说话的方式，他内心有困惑吗？他有所脆弱吗？他到底追求什么？追求的路上是否有过挫折，是否有过伤心？是否有过不想继续的时候……所有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困难，相对于其他制作层面遇到的问题，这是一个终极问题。

对中国老百姓来说，李大钊是一个象征，他是革命的先行者，革命的先驱，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对他的了解多少呢？在你的印象中，李大钊先生永远是个长者，他有大胡子，他知识很渊博，他是毛泽东的老师……印象中这个人应该是50多岁的人吧，但其实他很年轻，他真正的黄金10年就是我们现在影片中所呈现28岁到38岁这10年，他为中国做的所有事情基本都在这10年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电影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叙事方式？

徐展雄：《革命者》试图通过多视角来还原李大钊的一生，传统的传记片通常会采取线性叙事，一个人物从小讲到大，我们这次尝试打破这样一个常规的叙事的逻辑，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李大钊之间的交集，来展现李大钊这个人物不同的侧面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跟张颂文沟通这个过程的过程？

徐展雄：第一次见张颂文老师，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“展雄啊，我一定会把李大钊演成一个人！”我觉得在这一点上，我和颂文老师一直是同步的。我们希望银幕上呈现的李大钊首先是一个人，而不是某种超越人的存在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阿成、庆子这些虚构的人物，在故事中承担什么作用？

徐展雄：阿成和庆子是两个我们提炼出来的典型角色，就是想塑造一个在李大钊的感染下，从一个无知的小孩成长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草根人物，想通过他们的视角去看李大钊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能否用几个关键词概括《革命者》的主题？

徐展雄：首先是信念，李大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他曾经彷徨、挫折、犹豫，但他用他的信念去感化身边的同志，感化了他下一代的革命者。第二是热血，这是一个关于牺牲的故事，李大钊用自己的鲜血，革命烈士用自己的鲜血去换取民族、国家更好的未来。最后我觉得是青春，那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黄金年代，正因为年轻他们才有理想，才有热血，他们勇于奋斗，他们不怕跌倒。我想通过这部电影跟观众来说，不要忘记过去，这是革命的意义。

这是一部需要共情的影片，一部需要坐在影院里发生情感碰撞的电影。它能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观众，在走进影院的那一刻，共情共振、在同一个旋律上发生同样的颤抖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如何理解李大钊主动选择牺牲？

徐展雄：他首先是个文人，手无寸铁的文人。他主动选择了自己的牺牲，就史实层面而言，当时有很多人要营救李大钊，是可以把他救出去的，但他选择不走。他选择直面人生，直面鲜血，直面死亡，就像谭嗣同一样，没有一场革命不是用鲜血换来的，如果鲜血能够换来革命的胜利，就慷慨赴死，这就是李大钊的，我觉得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。

张颂文： 我只演出了守常先生的冰山一角

■ 文本报记者 林莉



采访张颂文对文字记者而言，是一种挑战。你似乎置身一堂生动的表演课，却无法将所听所感一一呈现。

从2020年10月接到电影《革命者》中李大钊的角色邀约，到12月电影开机，张颂文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准备。他用一个晚上看完了电影剧本，其它时间都用来查阅资料。李大钊存世的影像资料很少，张颂文辗转多处只找到了18秒的无声视频资料。靠着这仅有的18秒影像和大量的文字资料，张颂文在心中种下了一颗李大钊角色的种子。

张颂文是一个“较真儿”的演员，他相信旁观者对当事人痛苦喜悦的理解可能不及百分之一，他习惯从性格轨迹而非情节设计的角度分析角色的行为，也总爱追着导演和编剧探讨角色行为的必然性和连贯性。因为常常得不到满意的答案，他曾经自费报名一个心理培训班，尝试以更为理性的视角洞察人性。

出演李大钊，张颂文的出发点是还原一个活生生的人。《革命者》开拍前，张颂文跟工作人员说：“你们不要管我，我已经钻到这个角色里了。我们不用太多的设计，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最宝贵的。”还原李大钊、设计李大钊的角色在张颂文看来，是对表演和历史人物的双重不敬，他不相信一个人能在大银幕的有限时间内，完整真实地复刻一个伟人。他更愿意用“跟观众一起感受李大钊”来概括这段表演经历。

采访过程中，张颂文几次提到他喜欢演生理反应。就像指尖碰到火苗会本能地躲开，在他看来，不了解生理反应表演就没有章法。比如“大悲一定是疲惫的、气虚的，而不是亢奋或激昂的”。

没有设计，却有偶得。拍摄李大钊在监狱中独处的戏份，剧本原来的设计是李大钊一个人慢慢睡去。张颂文跟导演说人物这时候应该睡不着。他让摄影机在一边静静地跟拍。摄影机拍了他半个多小时，于是有了李大钊在狱中唱歌、追着探照灯作飞翔手影的精彩瞬间。

《革命者》中李大钊有一句台词，“试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天下”。拍摄这场戏的时候，周围只有绿幕和工作人员，张颂文在转头说出台词的瞬间，借助演员的内心视线，看到了满眼的红旗，完成了激情的表述。一场戏演完，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哭了。张颂文向记者回忆了早年做导游在异乡买药、焦急中忽然看到国旗时的狂喜和安慰，正是这些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垫高了每一个角色的起点。

“我只是一个塑造和扮演李大钊的人，我临时把躯体借给了这个角色。里面可能有一半以上是我在假设他会怎么想，另外一半可能是张颂文本人。”张颂文说。

“你演过一个人，演的过程中大量提取他的思想，做他做过的事情，电影结束了，但观念留下了。”张颂文说，他可能只演出了守常先生的冰山一角，甚至是千分之一，但是这个角色对他的影响会常伴一生，让他在最危险的时刻愿意挺身而出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这次在了解人物、阅读整理文献的过程中，有哪些让你特别动容的瞬间？

张颂文：很多。比如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上班，工资180块大洋，但他的儿子却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。后来，李大钊从生活费里挤出钱给儿子做了一件新大衣，看到学生穿着很薄的衣服，就把自己儿子过年的衣服送给了学生。

还有一个小事，当年的北大的校长蔡元培跟财务说李大钊的工资要交给赵纫兰。当时李大钊的同事也不理解，每个月180大洋家里怎么拿不开锅呢？后来才发现李大钊一般在拿到工资的最后一个礼拜就全部花完了，资助学生、印刷刊物、给共产主义小组提供活动经费……他家里大人、孩子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吃饭都成问题。这也是让我非常吃惊的。从这方面入手，我大概知道李大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的表演以细腻、真实见长，能否以一场戏为例，介绍一下您对演员的最高任务的理解和角色的处理过程？

张颂文：我们以李大钊带阿晨妈妈谈

判一场戏为例，这场戏的最高任务是李大钊带众人要求俄方交出暴徒，第一个镜头是李大钊带着众人在街上走，我也可以跑、可以慢慢地走，但我选择神色凝重、脚步坚定地走。为什么？因为昨天夜里，李大钊的好朋友阿晨死了，他很难过、印了一晚上的传单，他要唤起民众的觉醒，这里的走不能精神抖擞，而一定是神色凝重、再加一点疲惫地走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《革命者》采用了一种多角度、多侧面讲述的非线性叙事结构，对演员来说，如何准确地进入人物的每一个历史瞬间？

张颂文：这部电影有十几年的跨度，拍摄也不是顺拍。我在开机之前就跟着导演和场记说，让他们每天拍摄前告诉我，今天这场戏的具体时间，我多大了，有几个孩子了……关于李大钊的年鉴表，我已经装在了心里了，哪年哪月他在干什么，我心里有一个顺序脉络，只要现场告诉我一个时间点，我就能从年鉴表里找到对应的人物成长史。

通常我接到一个角色，必须的案头工作是看大量的资料，然后把这个人的一生在脑海中串联一次，我不会在开拍前做设计，我觉得表演如果能够这么理性，能精准预设每一次哭泣、心跳，对不起，我觉得那样一定很假。我会怎么表演，是下一秒决定的，不是提前预设的，否则是演不好戏的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作为一个广东籍的演员，出演李大钊台词上会做特别的准备吗？

张颂文：出于便于观众理解的考量，我们已经不再追求用方言塑造领袖人物，这次拍摄前我们也第一时间达成了共识，要用普通话完成表演。我演戏演了21年了，用普通话表演没有任何压力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是怎么看待毛泽东和李大钊之间的这种关系的？

张颂文：我读过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前后的很多战略思想，在对社会的解读上，跟李大钊是非常相似的。60年代他也曾对美国记者说，李大钊是我的精神导师。李大钊在众多学生当中，也是非常欣赏毛泽东的。所以我为人物关系定的第一个基调是李大钊一定很欣赏毛泽东；第二个就是两个人的沟通是无障碍的；第三他们俩是忘年交；第四，天下的老师都有传承的心，李大钊一定很欣赏这个叫毛润之的孩子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跟秦昊是老朋友了，聊一聊这次的合作？

张颂文：秦昊是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合作过最多的一个男演员。我们两个演戏很少商量，上手就来，也喜欢即兴地加入一些细节。这次表演有一点不大一样的，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有一种生命共同体的友谊，两个人一起经历的事情太多了，要将这种老友间的默契表现出来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看过彭显畅来演张学良吗？

张颂文：他演的少年感特别好，我跟他说你演这个人的冲动，因为你演的是少年张学良，撒开来演就行了。你忘了他叫张学良，记住他只是个少年，看见上海滩发生这样不平等的事情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抱着这个心态去演，肯定错了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怎么看李大钊慷慨赴死？

张颂文：从史料看，李大钊本人坚决不同意对他的营救。他一生中只被捕了这一次，陈独秀被捕6次都被救出来了，李大钊是共产党的最高领袖，为什么没有被营救？就是因为李大钊本人拒绝被营救，他要用牺牲告诉世界国民党是错的，他要死抗斗争。人最大无畏的行为莫过于如此了，他可以用牺牲证明自己的信仰，所以我在那场戏里增加了一段台词，“如果我的死可以唤醒那些麻木的人，我愿意去死！”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觉得《革命者》跟其他主旋律电影有什么不同？

张颂文：这次我和徐展雄导演、管虎监制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要让更多90后、00后的人发现这类题材的魅力，我有信心今天的年轻人能够接纳我们这个版本的李大钊。

《革命者》导演徐展雄： 打破线性叙事 多视角还原李大钊